

DUXIU

DUXIU SHE HUI KE XUE CONG SHU

• 独秀社会科学丛书 •

毛南族 史志概要

覃立新 编著

广
37.6
出版社

独秀社会科学丛书编委会

顾问：张可尧 李树民 余国琨

主编：钟文典 王定国

副主编：何成德 许弋华 周志诚

党玉敏 申咏秋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定国 毛思政 蓝育生

申咏秋 叶佩韦 许弋华

刘业林 刘世英 李家彦

何成德 张开政 张文祥

苏余年 陈卓祥 周志诚

钟文典 党玉敏 陶柱标

夏炎 黄理彪 覃树冠

曾定之 颜邦英 蔡雄



总 序

伟大的实践呼唤着伟大的理论，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科学。我国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强烈地呼唤着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科学事业蓬勃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进步，但与迅猛发展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相比，与时代的要求相比，仍然不甚相称。因此，必须加速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它在我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的指导作用，使它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为此，我们组织编辑“独秀社会科学丛书”。

丛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立足桂林，面向全国，面向世界。

其一，坚持鲜明的地方特色，突出反映研究桂林的社会科学成果。

桂林不仅山青水秀、风景优美，而且历史悠久、文化博大，是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 and 历史文化名城。桂林人杰地灵，历史人物众多，文化名人辈出，历史文物丰富。有远古先人留下的宝积岩和甑皮岩古人类遗址；有明代著王官吏的王府与陵墓；有太平天国革命、孙中山北伐、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等许多革命纪念地址和历史文物。桂林是桂系的发祥地，抗战时期成为闻名遐迩的“文化城”。历代文人士大夫咏诗赋词赞桂林，摩崖刻石题词塑像，留下了一处处“桂海碑林”。所有这些，无疑都是社会科学工作者耕耘的一块块园地，通过他们的画笔，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幅桂海春秋的历史画

卷。

其二，紧密联系实际，反映时代精神，推出社会科学研究最新成果。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桂林的建设和发展，向现实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亟需社会科学理论作出回答。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亟需社会科学理论有新的突破性进展。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历史所赋予的重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紧密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创立新学科，建立新理论，倡导新观点，回答和解决社会现实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桂林市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我们的丛书取名“独秀社会科学丛书”，意蕴有二：一是“独秀”者，桂林的“独秀峰”也。“桂林山水甲天下”，独秀峰乃桂林之象征。清代诗人袁牧诗云：“桂林山形奇八九，独秀峰尤冠其首”；二是突出创新，立意独到，出类拔萃，犹如唐代诗人张固赞美独秀峰那样：“孤峰不与众山俦，直入青云势未休，会得乾坤融结意，擎天一柱在南州。”

愿“独秀社会科学丛书”在祖国的社会科学丛林中也成为“南天一柱”！

桂林市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社会科学家杂志社

1990年5月15日

目 录

概 述.....	(1)
一、族称与族源.....	(9)
(一) 族称.....	(9)
(二) 族源.....	(12)
二、解放前社会生产发展状况.....	(24)
(一) 农业.....	(24)
(二) 饲养业.....	(28)
(三) 手工业.....	(30)
(四) 商业.....	(36)
三、解放前社会经济形式.....	(39)
(一) 从原始公有制经济到封建地主所有制经济.....	(39)
(二) 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与小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	(48)
四、解放前社会政治状况.....	(52)
(一) 封建王朝的统治.....	(52)
(二) 国民党政府的统治.....	(58)
(三) “隆款”组织.....	(63)
五、革命斗争传统.....	(66)
(一) 在古代反对封建王朝统治的斗争.....	(66)
(二) 在近代反对帝国主义、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斗争.....	(71)
六、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土地改革的完成.....	(82)

(一) 人民政权的建立	(82)
(二) 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	(89)
七、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重大成就	(94)
(一) 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胜利	(94)
(二) 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	(100)
八、生活习俗	(107)
(一) 居住	(107)
(二) 服饰	(109)
(三) 饮食	(111)
(四) 婚姻	(114)
(五) 丧葬	(117)
(六) 节日	(118)
(七) 伦理	(121)
九、宗教与迷信	(123)
(一) 祖先崇拜和多神崇拜	(123)
(二) 繁杂的宗教迷信仪式	(127)
(三) 禁忌	(136)
十、文化艺术	(139)
(一) 文学	(139)
(二) 戏剧与舞蹈	(153)
(三) 雕刻与编织	(155)
十一、教育与卫生	(159)
(一) 教育	(159)
(二) 卫生	(167)
后 记	(172)

概 述

毛南族是我们伟大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长期以来，毛南族人民和汉、壮、瑶、苗、侗、水、仡佬等兄弟民族密切交往，患难与共，在共同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民族情谊，建立了亲密团结的民族关系，为共同创造祖国的灿烂文化与悠久历史，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毛南族约于明朝嘉靖以后就已逐渐形成。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历代政府都无视毛南民族的存在，特别是国民党政府时期，当局对少数民族实行反动的同化政策，对包括毛南族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的存在，根本不予承认。由于深重的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毛南族人民没有取得应有的民族平等地位，不少毛南人特别是外出读书或从事谋生的毛南人，被迫长期隐匿自己真实的民族成分，甚至连毛南话都不敢讲，饱尝了民族屈辱之辛酸。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党的民族政策，对毛南族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语言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经过科学的民族识别，正式确定毛南族为单一民族，使毛南族永远结束了被人歧视的屈辱历史，取得了自己应有的民族尊严与地位。在尊重毛南族人民意愿的基础上，据毛南族的碑刻记载，毛南族始称为“毛难族”。1986年6月，国务院根据地方政府和毛南族人民的要求，改称为“毛南族”，并批准设立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使毛南族充分享有民族自治的

权利，步入了民族自治的新时代。

毛南族是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解放前，其人口长期徘徊在15000人左右，解放后有了较快的发展，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1953年全国首次人口普查计有18149人，1958年增至24235人，1978年增至31800余人，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计有38135人，1985年增为64000余人，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增达71697人。上述表明，1982年以后其人口有明显激增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随着民族政策的深入贯彻，不少毛南族人陆续恢复了自己本来的民族成分，并非实际人口的生育有如此快的增长。

毛南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的环江、河池、南丹、都安、宜山等县（自治县）境内，其中居住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最多。1982年和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分别计有31609人和54877人，约占全国毛南族总人口的75~80%以上。他们广布于全县的各个乡镇。据1990年人口普查，在下南乡的为19492人，上南乡为5629人，水源乡为8260人，川山乡为6052人，大安乡为2176人，木论乡为2135人，洛阳镇和思恩镇分别为3894人和5788人；还有长美、明伦、东兴、驯乐、大才、龙岩、上朝等乡镇，以及红茂矿务局，各分布有数十人至数百人，共为1491人。上南和下南两乡及其所包括的中南地方，素有“三南”或“毛南山乡”之称，是毛南族的最大聚居区。据统计，现在两乡毛南族人口共为25100余人，约占全国毛南族总人口的35%。

毛南族人口分布具有大集中，小分散的特点。在环江，“三南”是大集中，其他乡镇是小分散；在全国，环江是大集中，其他各地是小分散。据1982年人口普查，在河池县的

有2160人，主要居住在该县的拔贡、长老、塘甫、北香等地，居拔贡最多；在南丹县的多分布在与毛南山区隔打狗河相望的七圩、下坪、矿厂等地，共1549人，居七圩的最多；在都安瑶族自治县的有1078人，在宜山的有630人，还有少量散居于其他一些县市。据称，无论是散居于环江境内其他乡镇，还是散居于县外其他各地，多是其祖辈或因逃难谋生，或因躲避征兵，或因经商与通婚，先后从“三南”迁去的。散居的毛南人，长年与当地壮、汉等民族杂居，彼此交往密切，均已发生了民族间的自然融合。

毛南族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毛南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其语言的声母和韵母相当丰富，有65个声母，86个韵母，主要元音15个，声调8个，其中舒声调6个，促声调2个，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并且具有辨别意义的作用。毛南语同壮语、侗语、水语、仡佬语有许多共同点，关系非常密切。如与仡佬语相比，在480个基本词汇中，就有79个词汇声韵完全相同，有108个词汇的部分语音相同，故两个民族的语言基本上是相通的。毛南族人民由于长期和壮、汉族人民相互交往，许多人都能操壮语和汉语，并通用汉文。为弥补本民族无文字的缺陷，在历史上，毛南族人民还模仿汉文形声字的结构方式，假借汉字的音、义来拼写毛南语，构成“土俗字”，用以记载本民族的史诗、民歌和宗教经书等。

毛南族聚居的“毛南山乡”，地处云贵高原东麓的余脉之间，东北部有九万大山，西北部有凤凰山。中间屹立着茅难山（亦称巴音山）。境北与木论、川山两乡毗邻，东面与水源乡相连，南面与河池的拔贡接壤，西部隔着打狗河（龙

江上游)与南丹相望。境内石山绵延,重峦叠嶂,奇峰耸立,溶岩遍布,千姿百态。地势为西南高,东北低,海拔300—1000公尺。东北部是半石山区,在群山之间有大小不等的田垌,毛南语称为“龙办”,即村庄,有小溪流,可种水稻。西南是大石山区,在重山峻岭之间形成蜂窝状的大小垌场,毛南语称为“晓桐”,耕地散布其间,没有溪流,因缺水,只能种植旱地作物。

毛南山区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年平均温度为摄氏20余度,夏无酷暑,冬少霜雪。雨水较多,年降雨量可达1500毫米左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使毛南山区草木茂盛,四季常青,物产种类繁多。以农业为主有稻谷、玉米、小麦、高粱、小米、红薯等;经济作物有黄豆、烟草以及过去多种植的棉花等;土产有樟脑、棕皮、土硝、竹棉以及麝香、灵香草等名贵药材。林木有椿、枫、榧、松等。矿藏未经勘探,据历史记载和群众发现,有铁、锰、锑、水银、白铅等,还有藏量颇多的黑色大理石。

解放前,毛南山区交通闭塞,只有山间崎岖小道,不能通行车辆,货物全靠肩挑。解放后,修通了公路,经本县的川山、洛阳、水源等乡境,直达金城江,并通达县城等地,密切与县内各地以及与祖国各地的联系。

毛南族的历史悠久,其先民很早就在毛南山区繁衍生息。他们披荆斩棘,创建自己的家园。毛南族的先民,先秦时为“百越”的一支,隋唐时为“僚人”的一部分,宋明以后则为“伶人”。故毛南族与古越人、僚人和伶人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毛南之名,最早见于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一书,称为“茆滩”。以后在

汉文史籍及毛南碑文中又有“茅滩”、“茅难”、“茆难”、“冒南”、“毛难”等之称。这些同音异字的称呼，皆为地名，即指毛南人聚居的毛南山区。这些同音异字的地名，经过长期的演化而有“毛难”和“毛南”之族称。

毛南地区因地处边陲，开发甚慢，在唐朝以前，设治不明，史书统称“蛮地”。自唐起历代封建王朝先后都在这一带设置行政管理区。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开拓边地，始在今环江境设置环州及其所辖之思恩等八县，统属岭南道。毛南山区为思恩县地，归其所辖。思恩县在宋代先属环州，徽宗大观元年（1107）为溪州所辖，大观四年（1110）改属宜州，元明清直至民国归庆远路（府、区）。元明时代，封建王朝在毛南地区先后设有“茆菴团”、“茆菴堡”和“毛难甲”，明正德年间（1506—1521），思恩县改属河池州，全县分四乡，毛南地区为镇宁乡所辖，直至清代。清朝咸丰年间（1851—1861），因举办“团务”，全县分为前、中、左、右、后五团，毛南地区归后团直接管辖。民国年间实行区、乡、村、甲制，思恩县始设有毛南乡，辖松现等43个村。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广西实行乡村整编，毛南乡分为上南、中南和下南三个乡，直至解放。

毛南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他们长期生活在大石山区，在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创建生活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力量，不仅创造了日渐增多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了自己灿烂的民族文化，发展了自己的精神文明。他们根据山区的自然条件，除充分利用土地种植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外，还充分利用山区得天独厚的天然饲料，饲养猪、菜牛等家畜，发展家庭副业。他们饲养的菜牛，驰名中外，远

销港澳南洋，声誉很高，因而博得“菜牛之乡”的赞誉。毛南族人民还善编织与雕刻。他们编织的花竹帽，带有精细美丽的花纹图案，轻便、耐用、美观，是毛南族历史悠久的手工艺品；他们雕刻的木面具和墓碑、石桌、石水缸等雕刻制品，刻工精细，造型生动，富有民族风格，充分体现了毛南族人民的艺术智慧。

毛南族是喜爱唱歌的民族，属于善歌民族的行列。他们富有歌才，不少人能触景生情，随编随唱。歌词曲调不一，形式多样，主要有青年男女在户外对唱的“比”、喜庆时节在室内唱的“欢”和叙事长诗式的“排见”三种。毛南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与斗争实践中，运用自己的艺术智慧，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而最有成就的是为群众所喜唱乐听的民歌。

毛南族有爱书重教的优良传统，是文化比较发达的少数民族之一。在广西的少数民族中，通汉文的知识分子占本民族人口的比例，毛南人算是最高的。

毛南族民间过去多迷信“万物有灵”，崇拜多神，尤其崇敬祖先与三界公爷。逢年过节杀牲供祭，香烟不绝，举行多种多样的敬神祭祀活动。为求人畜兴旺还举行“起愿”与“还愿”的敬神祭祀仪式。老人去世时，请人做道场“开路”、“打斋”，以送亡灵。解放前也曾有基督教传入毛南山区，因而直至现在还有少数毛南人信奉基督教。

毛南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生活习俗。他们习惯于同宗聚居，村落依山而建，住房一般分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关养牲畜和堆放杂物，保持“干栏”建筑的特点。他们历来以农为主，田峒区

以大米为主食，山区则以玉米为主食，辅以红薯、芋头、小米、南瓜等。他们生活清苦，但能依山区所产，做出如“毛南粥”、“甜红薯”等富有山区特点和民族特色的食品。毛南人喜欢吃酸，有“百味用酸”的传统习惯。毛南族的传统服饰与附近壮族大同小异，男女均喜欢穿着蓝色和青色的大襟和对襟衫。毛南族除与壮、汉等民族共过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节日外，还有本民族特有的“分龙节”或称“庙节”，每年农历五月择日举行一至两天的庆祝活动。多礼好客是毛南人的传统美德。人们相遇，不论相识与否都予热情招呼；来了客人，都让出最好的卧室，竭力以最好的饭菜款待。

毛南族青年男女恋爱有自由，但过去盛行父母包办的早婚。他们也与其他民族婚配，尤其与壮族通婚较多，但以族内婚为主，除直系近亲外，五代之外即可通婚。一般是一夫一妻制家庭，但过去也有多纳妾的。结婚不拜堂，有“不落夫家”和“兄终弟及”或“弟终兄及”的转房婚等遗俗，寡妇再嫁受较多的限制。婚姻中的陋习，解放以后已逐步改变。

毛南族人民富有革命斗争传统。在历史上，他们长期与汉、壮等民族在一起，共同反抗历代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宋明时代，毛南族先民曾多次参加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近代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以及辛亥革命前后的“会党”起义，都有毛南人参加。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与壮、汉族人民共同组织了抗日游击队，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又和壮、汉族人民一起，建立革命武装，消灭了企图盘踞毛南山区的

国民党残余部队，配合解放军解放了毛南山乡。

解放后毛南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各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过去缺水干旱的毛南山乡，先后修建了南川、北甫、下甫等水库和盘山渠道，以及数百处的山塘水柜，逐步解决了农业用水和人畜饮水困难。同时除了修通直达县城和金城江的主要公路线外，大多数的村屯也都修筑了简易公路。在水利和交通发展的基础上，还建立小型水电站，增设了商业网点，逐步满足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现在加上外地供给的电力，许多村屯都已能用电力灌溉、碾米和照明，购置电视机和电冰箱的人家也逐日增多了。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不仅小学遍布山乡，而且建立了中学，建立了民族医院。过去文化落后、缺医少药的状况已逐步改变，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毛南族地区社会主义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更增进了毛南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共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把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一、族称和族源

(一)族称

毛南族的族称是怎样来的？对此说法不一。有同志说，“三南”地区过去因母老人居住，而被当地人以族名为地名。“毛南”是“母老”的音转和异写。它本来是族名，因族名而有“三南”此地名。从历史考察，此说是颇待商榷的。

宋代以来，历代汉文史籍及毛南族碑文中，曾有“茅滩”、“茆滩”、“茅菴”、“茅难”、“毛难”、“冒南”等不同的文字记载。从史料看，这些不同写法的文字是作为毛南这个地方的地名或行政区域名等使用的，均不是作为族名出现的。

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中写道：“自融（州）稍西南曰宜州。宜处群蛮之腹，有南丹州、安化三州一镇，荔波、羸河、五峒、茅难、抚水诸蛮。”又写道：“宜之西境有南丹州、安化三州一镇，又有抚水、五峒、龙河、茆滩、荔波等蛮。”《宋史·列传》亦有云：“观州则控制南丹陆家砦、茆滩十道及白崖诸蛮”。显然，宋史籍中的“茅滩”或“茆滩”等文字是作为地名出现的，而这里的居民则被称为“茅滩蛮”或“茆滩蛮”。

元朝时期，广西地区属湖广行省。《元史·地理志》载文道：省境内的“思州军民安抚司”辖区中有“茆难等团”；在“新添葛蛮安抚司”属内亦有“茅难、思恩、北郡、都变等处。”这里的“茅难”仍是地名，而“茆难团”则是行政区划单位的名称了。

明、清以至民国的史籍、碑文中，“茆滩”、茅滩、“茅难”等文字更屡有出现，用法亦更广了。明人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〇九《思恩县·普义砦》中写道，明正德年间(1506—1521)，“南丹酋莫提^①侵思恩地，于茆滩筑二堡，于普义、六传、川山三砦筑四堡。”清嘉庆《广西通志》卷一二一中亦写道，思恩县“普义相近有茆滩堡”。乾隆《庆远府志》卷一载：“思恩县……西至茅滩甲接河池州界二百里。”同治年间(1862—1874)刊行的《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中标有“毛难村”。乾隆(1736—1795)、道光(1821—1850)年间修撰的毛南族人的《谭家世谱》和谭氏墓碑中有““毛难土苗地方”、“毛难甲”、“来毛难安处”等记载。而毛南人奉祀社王祈祷文中犹云：“大清广西省庆远府思恩县镇宁乡冒南里居住△△村”等语。在毛南人宗教经典上又有“茆难安天，茆难通天，三位茆难”，“奏到仪容大庙茆难”等记载。这些文字表明，这时期“茆难”或“毛难”等的使用已趋多样。除了如“毛难土苗地方”等继续纯作地名使用外，更多的是兼作诸如“茆滩甲”或“毛难甲”、“冒南里”、“毛难村”等行政单位名以及村名使用，而“茆滩堡”和宗教经书中的“茆难”，则是作为军事设施名和神之名使用了。

① 莫提，谢启昆《广西通志》卷一二三引《府志》作莫扬。

1934年，伪广西省民政厅据光绪年间测绘的《广西舆地全图》编制的《广西分县地图》，在“思恩县概况”中有“茅难山隆起于茅难圩之西缘”的记载，表明“茅难”又是曾作为山名和圩名出现过。

1935年吴瑜编的《思恩县志》和1942年伪思恩县府编的《思恩年鉴》中分别有明正德年间思恩县设有“毛难甲”和“冒南话”“为本县特别语言”的记载，这里除“毛难甲”作为行政单位名再次出现外，“冒南话”则是作为语种名出现的。

通观史籍碑文所看到的上述“茆滩”、“茅滩”、“茅菴”、“茅难”、“毛难”、“冒南”等名称，都是今“毛南”一词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史籍或碑文中的同音异写，反映了“毛南”名称演变的历史进程。但所有这些不同写法的名称，从未作为毛南族的族称出现过，都是作为“毛南”这个地方的地名或行政区域单位名等使用的。这充分说明历代封建王朝和国民党政府根本就不承认有毛南族的存在。然而，毛南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了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生活习惯、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并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作为一个颇具特性的民族客观地存在着与发展着。由于他们同周边的壮、汉等族人民长期交往密切，故周围壮、汉各族人民都习惯地称呼他们聚居的地方为“毛难”或“毛南”。毛南人从来也以“毛南”之地自称，单称为“哀南”(aina:n)，
“哀”指人，“哀南”直译即“南人”，意即毛南地方的人；众称是“窘南”(kj uɲa:n)，“窘”，“众多”之意，“窘南”意是毛南地方的人们。壮族人称毛南人为“布